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全传

成思远/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#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## 李世民

(上)

戚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  
2006. 11

ISBN 7 - 80723 - 146 - 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  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 =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##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成思远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4600 千字

印 张:518.5

版 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 - 80723 - 146 - 7/I · 46

定 价: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# 目 录



第一 章 助父起兵	(1)
第二 章 太宗即位	(19)
第三 章 加强中央集权	(59)
第四 章 德治为主	(78)
第五 章 发展经济	(107)
第六 章 僥武修文	(122)
第七 章 选贤任能	(146)
第八 章 虚心纳谏	(176)



李  
世  
民

## 第一章 助父起兵

李世民正式登上政治舞台，是在大业十三年晋阳起兵时。晋阳是古老的重镇，李渊、李世民父子由此发难，“起义晋阳，遂登皇极，经纶天下”，开创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唐王朝。

—

晋阳起兵如同任何的历史事变一样，都不是英雄豪杰随心所欲的活动。它是隋末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长期发展的结果。

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，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。突出地颂扬李世民，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，或者被埋没，或者被歪曲。后晋刘昫等依据唐初实录而修的《旧唐书》，把李世民说成是“首谋”、“劝举义兵”的人物。宋代欧阳修等撰的《新唐书》干脆就说：“高祖起太原，非其本意，而事出太宗。”司马光主编的《资治通鉴》也说：“起兵晋阳也，皆秦王世民之谋”；“高祖所以有天下，皆大宗之功。”两个“皆”字，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李世民。同时，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，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，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。

其实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。李渊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翼代表人物，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头，只是在正式起兵前几年里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罢了。

大业七年，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揭开以后，统治阶级内部必将分崩离析，各谋出路。李渊目睹天下动荡的局面，开始产生了叛隋的想法。据《旧唐书·宇文士及传》载，渊与士及“往往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涿郡，尝夜中密论时事。”在涿郡是何年何月呢？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二记载，大业九年正月，“诏征天下兵集涿郡。始募民为骁果，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。”这年，李渊任卫尉少卿，督运于怀远镇，路过涿郡，与宇文士及有过密谈。所谈的“时事”，即起兵反隋之事。这可由李渊称帝后笑谓裴寂的话中得到证明：“此人（宇文士及）与我言天下事，至今已六七年矣，公辈皆在其后。”就是说，起兵前四年，即大业九年上半年，李渊与宇文士及密谈过取天下之事。大约与此同时，李渊根据窦氏生前的建议，特向隋炀帝进献“鹰犬”，作为“自安之计”，用这种策略手段来掩盖自己叛隋、取天下的意图。这些活动不仅是李渊的个人政治抱负的表现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隋末统治集团内部策划起兵的新动向。

不久，大贵族杨素的儿子、礼部尚书杨玄感就于大业九六年六月公开起兵，许多封建官僚的子弟奔赴依附之，可见上层分子中反隋的念头相当普遍。但是，李渊善察时变，他不但没有贸然行动，反而因告密有功，被隋炀帝任命为弘化郡留守。另一方面，鉴于“天下大乱，炀帝多以猜忌杀戮大臣”，因而“纵酒纳贿以自晦。”其实，纵酒即“沉湎”，就是装糊涂；自晦即“混其迹”，就是掩盖自己。李渊以“纵酒”作为“自晦”之计，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，这正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。如果以此而不加分析地把他说成昏庸的酒徒，是不公正的。

李渊到陇右后，一直在不断地窥测方向。当时，他身为弘化都（治合水，甘肃合水县）留守，兼管关右十三郡军事，妻兄窦抗曾跑来劝说：“玄感抑为发踪耳！李氏有名图，可乘其便，天之所启也。”但是，李渊认为时机未成熟，“为祸始不详”，叫窦抗别乱说。因为杨玄感起兵两个月后即遭到失败，闯这种“祸”，弄不好就会满门抄斩，李渊心里一清二楚，准备不好是不能行动的。

过了近两年，即大业十一年四月，李渊又任山西河东黜陟讨



李世民

捕大使，奉命前往镇压农民起义军。他推荐好友夏侯端为副帅，夏侯端颇知“玄象”，说：“金玉床摇动，此帝座不安。……天下方乱，能安之者，其在明公。但主上晓察，情多猜忌；切忌诸李，强者先诛，金才既死，明公岂非其次？若早为计，则应天福，不然者，则诛矣。”这番话是对当时形势和李渊处境的精辟分析。的确，杨玄感起兵客观上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。隋炀帝的宝座金玉床动摇了，更加猜忌左右宿将。民间传诵歌谣《桃李章》，“炀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，故诛李金才。”李金才原为右骁卫大将军，竟一门三十余人被杀。象李渊这样名望高、兵力强的宿将，不能不感到处境的险恶。因此，对于夏侯端的劝说，李渊“深然其言”，完全赞同。李渊称帝后，特地颁布诏令，追赠李金才为“上柱国”，说：“李氏将兴，天祚有应”。这说明李金才事件跟李渊起兵决心的加强，是有一定的联系的。

第二年，即大业十二年，李渊为右骁卫大将军，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。他“以太原黎庶，陶唐旧民，奉使安抚，不踰本封，因私喜此行，以为天授。”所谓“天授之意”，指的是叛隋起兵的时机快到了。当时的形势，李渊很清楚：各地农民起义军逐渐由分散趋向联合。“盗贼遍海内，陷没郡县，(隋炀)帝皆弗之知也。”因时，太原是军事重镇，兵源充足，而且“食支十年”，饷粮丰沛。同此，“私喜此行”。他把长子建成留在河东，命其“于河东潜结英俊”；而把世民带到太原，命其“于晋阳密招豪友”。兄弟俩“倾财赈施，卑身下士，逮乎鬻僧博徒，监门厮养，一技可称，一艺可取，与之抗礼，未尝云倦，故得士庶之心，无不至者。”这是为起兵作组织上的准备。所谓“得士庶之心”，反映了河东、晋阳一带地主豪强的心愿。

特别是在李渊升任太原留守以后，晋阳一带官僚、地主、豪商，如晋阳令刘文静、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以及崔善为、唐俭、武士彟等，都看到李渊有“四方之志”，纷纷劝说起兵。有的“见隋政日紊，密劝高祖图天下”；有的提出“首建义旗，为天下唱，此帝



王业也”；有的建议“北招戎狄，南收豪杰，以取天下，此汤、武之举也”；有的甚至献上属于“禁物”的兵书及符瑞，“阴劝高祖举兵”。如此等等，清楚地说明李渊是众望所归的人物，而密谋起兵则反映了关陇地主包括河东、晋阳地主的共同意向。

当时，拥护起兵的官僚地主所寄予希望的是李渊。例如晋阳长姜麟，觉察到李渊的动静，私下对自己的亲信说：“隋祚将亡，必有命世大才，以应图箓，唐公有霸王之度，以吾观之，必为拨乱之主。”于是，“深自结纳”，投靠李渊。可见，李渊的“命世大才”及“霸王”地位，是人们所公认的。

综上所述，晋阳起兵是李渊长期酝酿叛隋的必然结果。它最早萌发于大业九年，后因杨玄感起兵的惨败，暂时有所压抑。及至大业十一、二年，随着形势的急骤变化，李渊很快地就把反隋决心化为实际行动。这长达四年的酝酿过程，并不是李渊个人的任意活动，而是由隋末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制约的。正是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，把李渊推上了历史舞台，使他导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活剧。

## 二

李渊决定起兵后，一则苦于太原尚有不少隋炀帝的亲信，二则苦于忠于自己的军队兵力不足，所以没有马上举兵。

这年春天，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，占据郡城，自称天子，国号定杨。不久，刘武周又攻下楼烦郡（今山西静乐），占据了隋炀帝的离宫——汾阳宫。李渊认为这是集中军队的好时机，于是故意对副留守王威、高君雅说：“刘武周占据汾阳宫，我们如果不能尽快剿灭，当犯灭族之罪。”王、高二人惧怕被治罪，又计无所出，只好再三请求李渊拿主意。李渊又提出太原离江都路途遥远，如果事事请旨后再行动，势必延误时机，剿灭刘武周之事仍然难于成功。王、高二人只好同意一切事务由李渊专



李世民

决，他们二人表示绝对服从安排。于是，李渊命王威兼任太原郡丞，令他与晋阳监裴寂共同掌管粮廪、赈给、户口等事；命高君雅防守高阳（今河北高阳东），谋图调开高君雅，但未成功。尽管如此，李渊通过这次行动取得了兵马铠仗、战守事机、招募赏罚、军队征调等重大事务的专决权，这样就为后来的正式举兵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

李渊以讨伐刘武周为名，下令招募军队，十日之内，招募到壮士数千人，屯驻于太原兴国寺。李渊为了避免引起王、高二人的猜疑，没有去视察检阅这支军队，私下对李世民说：“纪纲三千，足成霸业，处之兴国，可谓嘉名。”可见李渊把这支军队看成是自己创业的基本部队。他命令刘弘基、长孙顺德分别统领这支军队。刘弘基因逃避辽东之役而亡命太原，长孙顺德是李世民岳父长孙晟之弟，也是因逃避辽东之役而逃匿在太原。李渊把兵权交给这两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，引起了高君雅的怀疑，他对武士彟说：“逃避征投，罪当处死，如何能领兵呢？”打算扣押起来审查。武士彟劝解说：“这二人是唐公之客，如果扣押势必引起纠纷。”高君雅遂隐忍不发。此事也引起了王威的怀疑，只是此人比较沉稳，不公开质询而已。李渊知道纸里终究包不住火，于是密派使者前往河东，催促李建成兄弟尽快赶往太原，准备起事。

在起事的准备基本就绪后，李渊先让刘文静伪造了一道隋炀帝的敕令，扬言要征发太原、西河（今山西汾阳）、雁门、马邑等郡年二十岁以上、五十岁以下的全部男子为兵，年底时集中于涿郡，要再一次征伐高丽。这样就使山西的民众更加激愤，“思乱者益众”。李渊此举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人心不稳、思想混乱，以便为其起兵寻找更有利的借口，在政治上先发制人。

就在李渊、李世民父子加快军事部署的步伐时，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眼看募兵云集，怀疑李渊有异志，便暗中策划晋祠祈雨大会。晋祠位于今太原市西南二十五公里的悬瓮山下，北齐天



保年间为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而建。王威、高君雅想把李渊诱骗至此地，加以杀害。然被经常出入于王、高家的晋阳乡长刘世龙探得此事，立即报告给李渊父子。李渊和世民、刘文静等商量后，决定先发制人。五月癸亥夜，李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外，严密封锁。次日清晨，李渊和王、高等在晋阳宫同坐视事，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刘政会至庭中，说“有密状，知人欲反”。李渊故意叫王威先看，刘政会却不给，说：“所告是副留守事，唯唐公得看之耳。”李渊接过一看，原是控告王、高等潜引突厥入寇。高君雅正想申辩，刘文静一声令，埋伏在后面的长孙顺德、刘弘基等一跃而出，把王、高囚捕起来。这一天，李世民布兵于交通衢道，以备非常。又一天，恰逢突厥数万骑兵入侵太原，李渊命晋阳宫监裴寂等勒兵应战。民众们都以为王、高确实是引突厥入边，李渊便名正言顺地把他俩杀掉了。这就是著名的晋阳宫事变，它标志着李渊、世民父子公开起兵了。

正当李渊积极准备进兵之际，突厥数万骑突然进逼太原，并进入外郭城北门。李渊面对强敌，沉着冷静，他一面将城门大开，城上不设旗帜，不许城上一人向外张望，一面令裴寂、刘文静等人率军分守诸门。突厥不知底细，不敢轻易进城，但也没有退兵而上。于是，李渊就于夜间派兵出城，占据险要之处，天亮之后又大张旗帜开进城内，使突厥误以为援军已到，更不敢轻举妄动。李渊还命令出城将士，突厥来攻只须据险而守，不要出战，若其退去，也不必穷追，只须尾随送出境而还，“使之莫测”。李渊的这种策略，使突厥手足无所措，又不敢轻易攻城，加之进入境内过深，怕遭不测，不久便主动撤兵退去。这一次行动再次显示了李渊足智多谋的军事家风范。

太原解围后，李渊认为突厥问题如不解决，将始终有后顾之忧，无法向关中进军。六月，李渊主动向突厥始毕可汗写信，卑辞厚礼，与之通和。信件的大意说：天下丧乱，百姓困苦，我举义兵，为救百姓，迎回主上。愿与可汗和亲，征伐所得，子女玉帛，



李世民

皆归可汗。信写好后，“仍命封题，署云某启”。有人认为突厥不识汉文字，请改“启”为“书”。李渊认为乱离以来，内地读书之人投奔突厥避难者不少，如果有人进行挑唆，将不利于创业大事，并说“且启之一字，未值千金，千金尚欲与之，一字何容有吝”。坚持用了“启”字。李渊这种不拘封建礼节的做法，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。突厥始毕可汗得信后，喜出望外，但他主张不要迎回炀帝，劝李渊取而代之，自为皇帝。李渊推辞了一番后，决定尊隋炀帝为太上皇，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。

李渊与突厥讲和后，免除了后顾之忧，但苦于军中缺马，于是突厥派人送来良马千匹，到太原交易，并答应遣兵助李渊攻取关中，需要多少军队由李渊决定。李渊在即将南下之时，派刘文静入突厥请兵。临行时李渊交代他兵多恐骚扰百姓，太少无甚大用，“公宜体之，不须多也。”李渊请突厥派兵的主要目的在于壮声势，同时可以制约刘武周，防止他向太原进攻。换句话说，李渊向突厥请兵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，所以，他不愿突厥兵大量进入国内，反倒对自己碍手碍脚。

起兵之后，在关于旗帜用什么颜色上发生了争执。突厥的旗帜为白色，隋朝的旗帜为红色，李渊军队的旗帜用什么颜色，实质上是从隋朝还是从突厥的问题。军司以起兵在甲子之日，请“执白旗以示突厥”。李渊主张“杂用绛白”，即旗帜赤白相间，表示既不从属于隋朝，也不依附于突厥。李渊还令汾、晋百姓传唱《桃李子歌》：“桃李子，莫浪语，黄鹄绕山飞，宛转花园里。”李为国姓，桃作陶，即陶唐，配之以李，故此歌谣又称《桃花园》。李渊目睹绛白旗幡，耳听《桃花园》之歌，不觉豪气大发，说“花园可尔，不知黄鹄如何。吾当一举千里，以符冥讐”。李氏父子革代易姓的企图于此已昭然若揭了。

七



## 三

隋朝在荒年闭仓拒赈，大失民心。瓦岗军李密反其道而行之，数次大规模开仓济民，壮大了力量。李渊深知其中奥妙，也在太原打开官仓救济贫民，应募之人越来越多，二十日内得兵数万，并传檄诸郡，自称“义兵”。辽山县（今山西左权东北）今高斌廉拒不从命，派人疾速前往江都，报告李渊起兵之事。炀帝得奏后，非常恐惧，急令洛阳、长安严加备御。李渊认为辽山小城，不足为虑，惟西河郡丞高德儒不肯听命，挡住了李渊南下的道路，必须扫清障碍。

李渊命李建成、李世民兄弟率军前去进攻西河郡（今山西汾阳）。临行时李渊再三勉励他们要努力作战，争取首战胜利，并命太原县令温大雅为参谋军事，协助指挥。当时军士集中起来没有多久，大都不熟悉战阵，建成、世民兄弟都是青年将领，未曾单独指挥过一支军队，但“义兵”军纪严明，上下一心，士气非常高昂。建成、世民能与士卒同甘共苦，作战时身先士卒，百姓菜果，非买不食，因而民心大悦。兄弟二人一路顺利，很快攻下西河，斩杀高德儒，此外不戮一人，秋毫无犯，慰抚百姓，使之复业。从出兵到返回太原，只用了九天时间，李渊对此战非常满意，认为用这样的军队，可以横行于天下了。

此战之后，李渊建置了大将军府，建立三军，分为左右，军士称“义士”。命李建成成为左领军大都督，统率左三统军，封陇西公；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，统率右三统军，封敦煌公。以李元吉为太原郡守，留守太原。以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，刘文静为司马，武士彟、温大雅、殷开山、唐俭等人为大将军府掾属，以刘弘基、长孙顺德、王长阶等人为统军、副统军。其余文武职员，随才选用。至此，李渊借以争夺天下的军事、政治机构就组成了，同时也把改朝换代的愿望变成了实际行动。



七月，李渊在太原誓师后，亲率大军三万经西河向霍邑（今山西霍县）进兵，行至距霍邑五十余里的贾胡堡，逢连日大雨，只好驻扎在这里，待机进兵。在长安的代王杨侑得知李渊起兵，遂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守霍邑，又命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屯守河东，阻挡李渊的进兵。

这时在贾胡堡的李渊不仅碰到连日大雨、无法进兵的问题，粮食也因雨而接济不上，同时又传说刘武周联合突厥进攻太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向前攻取霍邑，还是后撤解救太原，成为李渊必须作出决断的大问题。他召集李建成、李世民及部下众官商议对策，有人认为太原是义兵的根据地，家眷、给养皆在此城，突厥见利忘义，不可相信，一旦太原有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种主张明显是倾向还救太原。李建成、李世民坚决反对这种意见，他们分析道：刘武周与突厥外虽相结，内实相猜，突厥欲想取利，马邑近在咫尺，何必远到太原？刘武周深知突厥习性，未必会离开马邑进攻太原。如果退军还师，必然人心涣散，宋老生、屈突通势必追击，军队将会一朝瓦解。现今庄稼已经成熟，军粮问题不足为虑。宋老生为人轻躁，破之不难，功业成败，在此一战。请雨停后进军，如果不能攻下霍邑，斩杀宋老生，儿等愿意以死相谢。两个儿子坚决主战的决心，增强了李渊攻占霍邑的信心。不久，太原的军粮运到，八月，天气转晴，全军士气高昂，李渊开始部署进攻霍邑的战斗。

李渊最担心的就是宋老生闭门坚守，以致战斗旷日持久，贻误战机。建成、世民认为宋老生勇而无谋，可以轻骑挑战，宋老生一定会出城迎战；如果他固守不出，可采用反间之计，散布宋老生畏惧不战、想要投降的消息，老生恐其左右上奏给炀帝，必定出城来战。李渊说：“你们的分析很有道理，宋老生没有乘我军缺粮时进攻贾胡堡，我就知他无所作为。”于是，李渊亲率数百骑兵到霍邑城东五六里处布阵以待，命建成、世民各带数十骑直至城下视察地形，以示攻城之意，并命军士辱诟老生。宋老生



大怒，以其军主力从南门、东门两路出城迎战。李渊恐宋老生背城而阵，不肯远去，命令军队向后佯退，诱使宋老生来追。这时殷开山等所率步兵已经赶到，李渊命他正面迎敌，命建成、世民从左右两面直冲城下，堵死宋老生的退路，然后两面夹击，双方在城外展开了殊死决战。为了瓦解隋军斗志，李渊令军士大声传呼：“宋老生已被斩首！”隋军听到后大乱，抛弃甲仗，争相溃逃。宋老生见大势已去，遂向城门退去，由于各城门已由建成、世民所率之军堵截住，宋老生不得入，城上人抛绳引之，宋老生攀绳欲上，被追兵赶到斩杀。这时，天色已晚，日将西落，李渊见军士斗志正盛，遂命乘锐攻城，在没有攻城器具的情况下，一鼓作气攻克了霍邑。

接着，李渊经临汾（今山西临汾），下绛郡（今山西新绛），到达龙门。这一路只在绛郡稍遇抵抗，其他诸城闻风而下。这时，刘文静引突厥兵五百人，马两千匹也到达这里。李渊十分高兴，对刘文静大加赞扬。因为刘文静完全是按李渊的嘱咐办事，马多可以增加战斗力，兵少则不必担心闹出什么乱子来，达到了李渊原先设想的借突厥之力以张声势的目的。

在李渊兵临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之时，河东仍为屈突通所据守，这样就有一个问题，究竟是西渡黄河，占据关中，还是攻取河东，歼灭屈突通军。有人主张首先攻取河东（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），也有人主张先从龙门渡过黄河，夺取水丰仓（在今陕西华阴东北渭河岸），再逐步攻取关中诸城，进而夺取长安。李渊分析了两种意见，决定兵分两路，主力渡河攻取关中，同时留相当的兵力对付屈突通。这种部署充分地反映了李渊作为一个军事统帅用兵稳重的特点。后来，长安攻下后，屈突通见大势已去，只得投降。如果当时不采取分兵攻略的部署，倾全力攻长安，屈突通必然出兵援救，唐军便会有两面受敌之患；或者重点攻取河东，使长安有时间收缩各地兵力，则长安便不可能唾手而得。



李世民

这一时期关中的形势是农民军遍地皆是，隋军只占据着一些重要的城市。在这许多支起义军中，以冯翊（今陕西大荔）人孙华一支势力最大。李渊派人与他联系，孙华表示愿意归附，并亲自从邠阳（今陕西合阳）率轻骑渡河去见李渊。李渊与其握手言欢，大加奖慰，任命孙华为左光禄大夫、武乡县公、冯翊太守。令其先行过河，准备迎接大军渡河。沿河百姓见李渊军纪严明，争献舟船，每日达百余艘之多，于是李渊就将这些水手改编为水军。在渡河条件成熟后，李渊派王长谐、刘弘基、陈演寿、史大奈等，率步骑六千人渡河，驻扎于河西，掩护大军过渡。这支部队渡河后，很快就占据了韩城（今陕西韩城）。

在王长谐、刘弘基渡河之际，李渊嘱咐他们要见机行事，如果屈突通派兵阻击他们，李渊就率大军直取河东；如果屈突通坚守不出，他们必须断绝蒲津桥（在今山西永济西黄河上），使屈突通不能渡河，处在李渊军与王长谐、刘弘基军的夹击之势下。果然不出李渊所料，屈突通派桑显和率军数千夜袭王长谐军。在孙华等的配合下，王长谐等大败桑显和，桑显和逃回河东，自断蒲津桥。李渊见隋军新败，士气低落，遂亲率大军直攻河东，在部分兵士已经登上城墙的情况下，李渊命令退下。他这样做，目的不是要真正攻取河东，而是要屈突通不敢出城再战，以便使自己顺利渡河，用李渊自己的话说，只是“示威而已”。然后留军围城而不攻，自己率大军渡过黄河。

在李渊行将渡河之时，隋朝的冯翊太守萧造、华阴县令李孝常等相继归降，永丰仓也为李渊年所占据，此外，京兆万年（今陕西西安）、醴泉（今陕西礼泉）等地官员也派人和李渊联系。李渊渡过黄河后，驻于朝邑（今陕西大荔东朝邑镇）的长春宫。这时，三秦士庶、郡县长史、豪强子弟，扶老携幼相继来投者甚多。可见关中人民及官僚地主都迫切希望李渊能改朝换代，这也是对隋炀帝暴政不满的一种反映。

李渊命李建成、刘文静、王长谐等率军数万屯于永丰仓，扼



守潼关；命李世民、刘弘基、长孙顺德等率军数万西进，经高陵（今陕西高陵）、泾阳（今陕西泾阳）、武功（今陕西武功西北）、盩厔（今陕西周至）、鄠县（今陕西户县），迂回进攻长安。李世民西进途中，吏民及小股起义军归附者甚众，到达泾阳时队伍就已经扩大到九万人。接着，又会合了李神通和李渊女平阳公主所率的军队，声势更加壮大。

李神通为李渊的堂弟，李渊太原起兵时，他正在长安，因隋朝官吏要逮捕他，他就逃入鄠县山中，与史万宝等人聚兵响应李渊。李渊军入关中时，他已攻下鄠县，有兵万余人，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。

平阳公主与丈夫柴绍也在长安，李渊准备起兵时，密召他们赴太原，柴绍认为夫妻偕行容易暴露，遂与妻子分手，要她暂时躲藏起来，自己单独奔赴太原。柴绍离去后，平阳公主潜回鄠县自己的别墅，散家资，聚徒众，起兵响应李渊。当时，在盩厔司竹园一带有一西域胡商何潘仁，拥有一支数万人的起义队伍，平阳公主派家奴马三宝游说何潘仁，使他帮助李神通攻下鄠县。平阳公主又派马三宝联络附近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李仲文、向善志、丘师利等，动员他们参加了平阳公主的队伍。隋西京（长安）留守屡次派军讨伐，都被何潘仁等击败。平阳公主乘胜攻下了盩厔、武功、始平（今陕西兴平东南）等地，组成了七万余人的大军。由于马三宝在这些活动中立有大功，李渊把他与西汉家奴出身的大将卫青相提并论，称之为英雄。平阳公主率领的那支队伍因主帅是个“娘子”，故被时人称作“娘子军”。娘子军在诸义军中纪律最为严明，平阳公主特别注意申明法令，禁止士兵烧杀抢掠。对于犯禁的人，不论亲疏和功劳大小，一概惩罚。这样一支军纪严明的武装在隋末乱兵四起的年代，立刻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。因此，娘子军每到一处，老百姓都送水送饭，夹道欢迎，亲切地称平阳公主为“李娘子”。不少人还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投军。



一开始，隋将屈突通并没有把平阳公主放在眼里，以为她小小年纪，又是个女流之辈，一定成不了气候。不料，娘子军越战越勇，很快就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七万人的大军，屈突通连忙从京城调集精兵征讨，但连续几次交手，都被沉着应战的平阳公主打败。此后，“娘子军”的声名远扬，威震关中。

这时，李渊所率唐军已连破临汾、绛郡，李渊避开屈突通设防的蒲州、风陵渡一线，转而从西北龙门山下，直逼河西韩城、郃阳。

李渊进军至壶口，平阳公主、李神通与在蓝田起义的李渊另一女儿高密公主及其丈夫段纶，都派出使节迎接李渊。李渊大喜，即派柴绍率骑兵数百名往南山（秦岭山脉）去迎接平阳公主。

平阳与柴绍久别重逢，欣喜非常。柴绍更觉诧异，自分手到相聚才几个月的时间，小妻子竟长成了一个女丈夫。平阳公主随丈夫与父亲会师，并与丈夫分别设立总部，仍称“娘子军”，每日征城守关，不甘落后。

后来李世民为牵制敌人，只带少量队伍在渭北一带活动。平阳公主听说后，为佐助兄长，亲自从“娘子军”中挑选一万名精兵渡过渭水赶去增援。“娘子军”的参战使李世民如虎添翼，他西夺挟水，南济渭水，取司竹，破阿城，主要依靠的就是这部分队伍。平阳公主跟随兄长一起并肩作战，风餐露宿，从不低头，给了李世民以意想不到的帮助。

唐朝建立后，李渊特封女儿为平阳公主，同其他皇子一样置幕府、建僚属。故而平阳公主死后李渊要破格用军礼礼葬。

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，在平阳公主死后仍受到李世民的恩宠，不断加官进爵，死后还谥号为“襄”。

平阳公主与柴绍生的儿子柴令武，娶李世民的女儿巴陵公主为妻。后来，二人在参与高阳公主与房遗爱的谋反案中为李治所诛。